

权力的边疆

美国反垄断制度体系确立路径研究 (1890~1916)

The Frontier of Power: the Path of American
Anti-monopoly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王建红 著

工业化引发美国社会的新问题，反垄断成为重返民主传统、进行文化重建和新身份确认的核心语式。美国反垄断从破解大公司市场控制权入手，到工业化市场权力与利益多元制衡管理体系的生成，完成了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制度变迁。



经济管理出版社

权力的边疆：美国反垄断制度体系 确立路径研究(1890—1916)

王建红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的边疆: 美国反垄断制度体系确立路径研究: 1890 ~ 1916 / 王建红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96 - 2181 - 3

I. ①权… II. ①王… III. ①反垄断—研究—美国—1890 ~ 1916 IV. ①D971. 22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9417 号

组稿编辑: 孙 宇

责任编辑: 孙 宇

责任印制: 黄 铎

责任校对: 李玉敏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 / 16

印 张: 14. 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2181 - 3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产业结构剧变与托拉斯的崛起	26
第一节 过度竞争与托拉斯的出现	26
一、组织化的竞争与联合	26
二、从“普尔”到“托拉斯计划”	29
三、“托拉斯”的概念	37
第二节 现代托拉斯及其社会效应	39
一、现代托拉斯组织的衍生创新	40
二、现代托拉斯诞生的技术背景	47
三、财富福音与物质价值	48
第二章 殊异的社会反应与反托拉斯立法	53
第一节 剧变的社会影响	54
一、“草根”民主传统的社会压力	55
二、亟须消除的政治腐败	59
三、州与联邦经济管理权限的新辩论	60
第二节 联邦反托拉斯立法	63
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政治管理意图	63
二、普通法原则的法典化	67
三、“限制贸易”与“商务条款”的宪法背景	77
第三节 抵制集权立法意图	81
一、州反托拉斯立法	81
二、条款的合宪性	83
三、立法的“多元制衡整合”目标	84
第三章 联邦最高法院的反托拉斯判决	90
第一节 非普通法原则	90



一、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判决原则的冲突	91
二、非普通法解释	94
三、“本身违法原则”的确立	98
第二节 普通法原则	101
一、1911 年普通法判决原则的恢复	102
二、“合理原则”	104
三、“合理原则”在判决中的转变	107
第三节 多元制衡整合的司法目标	111
一、对国会立法意图的理解	111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意图	117
三、司法解释的结果	121
四、判决的多元制衡整合路径	122
第四章 反托拉斯的行政程序	126
第一节 集权式的反托拉斯行政程序	126
一、西奥多·D. 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及其 “政治权力统制”观念	127
二、“联邦企业署”的建立	133
三、转向行政集权式管理	137
第二节 非集权式的反托拉斯行政程序	140
一、非集权式的反托拉斯政策	140
二、市民联盟的折中法案	148
三、独立“贸易委员会”草案	150
第三节 反托拉斯集权管理合宪运动的失败	153
一、政治统制式干预的宪政障碍	154
二、修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156
三、《赫伯恩草案》集中管理权力的意图	162
四、行政集权式管理合宪努力的挫败	166
第四节 权力与利益的多元制衡整合程序	169
一、1912 年政治形势的影响	170
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173
第五章 反托拉斯多元利益制衡整合制度的形成	178
第一节 反托拉斯与社会观念变迁	179

一、财产权：从特权式自然权利到合理价值	180
二、企业界的“多元利益制衡”观念	186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均衡意识	189
第二节 国家政治的利益中介职能	191
一、政府管理经济的新功能及其实现方式	192
二、经济管理权力从州向联邦转移	194
三、反托拉斯的行为原则	196
四、反托拉斯与美国经济国际化背景	198
结束语	201
参考文献	204
后记	219

导 言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制度变迁往往引领社会转型。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导致美国社会的新问题。其中牵涉传统民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重新适应，美国传统文化的工业化重建与美国人新身份的确认等。反托拉斯成为工业化美国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核心语式。

“托拉斯”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产业资本权力集中的产物，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小企业以“横向合并”与“垂直合并”方式与主导企业合并，争取市场份额。多部门集中管理的大公司及其庞大管理阶层的形成，使以一体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大公司成为美国经济中的统治力量。

托拉斯(Trust)原指信托，是对某人财产与遗孤进行委托管理的法律程序，在美国工业化时期，“托拉斯”成为商业集权与垄断的代名词。工业化初期，一些大公司为向州外扩展业务，进一步扩大商业范围并控制市场，寻求跨州兼并。但州法律规定，本州公司不能在外州拥有财产，成立新的联合公司必须通过新的州特许立法予以确认，每成立一个新公司就意味着一次特许立法。为躲避州法管制，通过受托理事会以控股方式对各州所属公司的企业活动实行统一管理。集中管理使托拉斯发展成为纵向一体化的多部门巨型企业。美国的史学研究对该问题的缘起、发展路径、最终解决方式、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以及该问题在大变革时期对美国政治前途的选择有何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有一定探讨。但在所能收集到的美国历史学文献里，没有对托拉斯问题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往往是在论述大变革时代社会改革与大企业问题时旁及该论题的某一侧面，使对该问题有兴趣的读者理解时不免有空中楼阁之感，管中窥豹，不得其全。经济结构变迁语境下，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一直伴随着这个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制度切入点，现综合评述美国几个主要史学流派、若干法学和经济学著作对托拉斯问题的解释框架、分析方法及主要观点，且对国内反托拉斯研究的基本动态予以介绍。

(一) 进步主义学派及社会学的相关激进分析和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论及大企业家问题的还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其他社会科



学工作者。社会学家们力图用他们看到的一切，证明工业资本主义体系是自我与自利标底的社会身份确认系统。其中，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索斯滕·范勃伦和 E. A. 罗斯含蓄地批评大企业家掠夺成性、唯利是图、道德败坏，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社会改革。还有古斯塔夫·米叶斯和阿尔钦·西蒙斯，都把企业家描述成“财富造就的坏分子”，这两位社会科学家期盼着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作为历史进化不可避免的宿命而出现。

1850~1877年，内战引人注目的同时，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最早对该问题做出部分论述的是当时人论当时事。1886年，安德鲁·卡内基颇为自豪地写成《成功者的民主》一书，“美国已位居世界强国之列，物质进步将带来精神与文化进步，在人丁兴旺、积累财富、扩充岁入、公共信用还有殖产兴业等方面，已是文明世界的领导了”^①。但其他人却对大公司的出现有着更多担心，认为它败坏了美国人的品行，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前景》中对大托拉斯则表现得忧心忡忡，“大企业阶层从社会攫取的利益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多，它使政府渎职、行政腐败、劫掠成风，我们的民主虽然在物质上取得成功，却在社会道德、公众信仰等社会领域完全失败了”^②。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富裕，美国人无所适从，因而对物质繁荣的态度表现得很骑墙，在强调追求财富、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同时，因为不能调和物质主义和与理想主义的内在矛盾，清教平等自由遗产与本土文化使命感的历史大网挥之不去。一些美国人用物质财富是精神和文化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为前提来解决这一矛盾；另外有人批评因物质利益而牺牲其他价值观的社会制度；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的繁荣是它高尚道德品行的表现。对传统民主制度与历史遗产的模糊态度，给史学家历史叙事的价值取向带来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家对大托拉斯的崛起及其社会含义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大公司不仅仅是工业主义的标志，它也是现代美国文化基本品质的标志。对20世纪初大工业成果的最初评估来自记者、学者亨利·戴莫莱斯特·劳易德的《财富对抗共和国》，他于1903年去世，对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改革运动有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许多早期述评工业化社会问题的学者都从这里获得过启发。他批判自由放任式的大公司垄断行为，认为美国正“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③，该书研究了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对石油行业垄断所用手法后，提

① 安德鲁·卡内基 《成功者的民主》(Andrew Carnegie, Triumphant Democracy)，纽约1956年版，第1页。

② 瓦尔特·惠特曼 《民主的前景》(Walt Whitman, Democratic Vistas)，纽约1963年版，第270页。

③ 亨利·戴莫莱斯特·劳易德 《财富对抗共和国》(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纽约1946年版，第517页。

出“大企业家令人憎恨，他们对竞争原则顾及甚少，其真正目标是获得垄断，他们若一意孤行，自行其是，美国将会有暴力流血的阶级冲突，失望、仇恨、瘟疫、无助在弥漫，公众对垄断的控制与政府职能的日益强化已迫在眉睫”^①。劳易德本人呼吁美国社会进行重新整合时，不经意间对大企业与大企业家的影响作了不很乐观的描述。许多改革家、平民党人都与他持同样的见解，针对反托拉斯而致的社会改革活动，主要集中力量约束失控的经济权力，并纠正工业大佬们的冷酷和自私，他们放纵积聚财富的欲望，不顾其他美国人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所以进步主义时代最特殊的政治问题就是反托拉斯与如何实施对大托拉斯实施联邦管制。美国公众对大托拉斯的理性认识最早也来源于这些早期社会学方面的著作。

直到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史学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国大工业兴起的研究上。1927年，查尔斯·比尔德和玛莉·比尔德夫妇著《美国文明的兴起》和弗农·帕林顿著《美国的主流思想》出版，历史学家们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开始探索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以阐释自己对民主与改革的偏好。20世纪20年代，揭穿企业家发家史成风和30年代大萧条背景之下，大企业家成了“强盗大王”。该学派以民主与少数人经济权力集中相对立的二元语式来解释托拉斯问题。认为大托拉斯造成的“横向兼并”与“垂直兼并”导致19世纪末叶的美国社会生活成本过高。个人主义价值观将被大托拉斯自己的强势伦理所摧毁，美国因而将不再是美国。比尔德对美国工业文明的全景式研究没有直接批判工业巨头，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新的经济现象，但暗示他们像“中世纪在自己地盘上作威作福的专制君主和贵族”，把美国工业的历史描述成“大公司发展高度不规则或有时使用非法手段，残酷竞争、诡诈恐吓和无情毁灭的编年史”^②。

帕林顿更加清晰地描述了“一战”后美国工业发展状况，他在杰弗逊个人主义理想的农业国家理论框架下，把大企业家描写成“对人道和民主等造就强大美国价值观有最大威胁的群体”。他寻找证据极力维护其心目中田园诗般的自由主义，认为“这些工业巨头就是那些灵魂原始、残酷无情、嗜血掠夺、手段高明但却头脑简单的人；常常不择手段，也从不埋怨叹息，是一群资本积累式海盗的原始翻版”^③。20世纪30年代对“强盗大王”的批判达到高峰，许多非学术界人

① 亨利·戴莫莱斯特·劳易德《财富对抗共和国》(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纽约，1946年版，第517页。

② 查尔斯·比尔德与玛莉·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Charles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 2)，纽约1927年版，第二卷，177页。

③ 弗农·帕林顿《美国的主流思想》第三卷(Vernon 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Vol. 3)，纽约1967年版，第26页。



物参与到批判中来，1930年刘易斯·科利著《摩根家族》，详述了垄断性大企业在银行业和投资领域对资产超过20亿美元的大公司，如何实施近乎独裁的控制。但科利罗列这些内容的目的，是要用尽可能多的证据表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私和腐朽性。还有马修·约瑟夫逊于1934年著《强盗大王：1861~1901年的美国大资本家》，这本著作从有和无、债务人与债权人、农场主与企业家、劳工与资本家二分法的角度，解释了大企业家的活动及其时代境遇，试图描绘一个从内战开始崛起的大企业阶层如何迅速拥有了权力^①。众所周知，他们在美国工业革命时代扮演了主角，美国人的经济生活，通过他们得以丰裕。大范围的规模化生产代替了分散的生产模式，企业组织更加集中化，技术革新，效率提高，且产业合作趋势愈加明显，但所有这些革命性效果都出于大企业家私人收益的动机。富庶与贫穷之间的转换如同走马灯，社会矛盾被不可调和的力量激活，并不断对旧的社会交往方式发起冲击。他已开始正视工业化所致社会流动加速的现实，而不像早期进步主义史学家那样，只从激进立场上批判它。约翰·提泊也持与约瑟夫逊相似的观点，在《资本家的革命：一部美国社会思想史（1899~1919）》中，他认为19世纪末，相对少数的小企业家群体利用大企业组织形式积累起巨额财富，并走向反面，促使个人自由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没落。特权是企业的胞生现象，其结果是权力转移到相对少数经济精英手中。进步主义史学站在传统价值观立场上，过多地看到大企业的负面影响，没有正面考察美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性，因而对大企业表现出过多的批评。

（二）企业史学派对托拉斯问题的研究

当社会科学界对大企业家“强盗大王”概念建构成熟之际，“企业史”研究崛起。20世纪30年代，企业史研究的基础已奠定，托拉斯问题又成为该学派关注的焦点。企业史学派拥有自己专门的研究组织，出版自己的刊物，甚至有些大学建立企业史研究系、所。注重大企业组织形式研究是该学派的一大特色，他们感兴趣的是主导企业如何兼并中小企业，最后形成具有垄断地位的大托拉斯，因而企业管理的技术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另外，该学派的不同学者运用数学方法和经济学理论，对大托拉斯的规模效应和经济实绩进行了正反两方面评估，大多只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托拉斯内部的运作及其在工具理性层面上所具有的意义，没有涉及太多价值判断。因此，该学派的结论更倾向于实质袒护企业的中立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大企业的努力与创造使国内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尽管有时他们的策略值得怀疑，但这些大企业很快恢复了秩序与理性，充分利用资源，在更深广的空间里发掘出美国经济的潜力。

^① 马修·约瑟夫逊《强盗大王：1861~1901年的美国大资本家》（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ert Baron: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纽约1934年版，第453页。

诺曼·S. B. 格兰斯及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对托拉斯问题认识得更复杂：他们并不只是金钱的饕餮，而是对美国经济创新做出贡献的才智分子。在企业史学家眼里，大托拉斯的效率和秩序将美国造就成强大的现代美国。商学院其他学者的著作都对个人主义的大企业家进行申辩，他们从进步主义史学的旧框架中走出来，用自己的理论术语去解释大企业问题。在《约翰·D. 洛克菲勒：美国企业史上的英雄时代》中，阿兰·尼文斯认为，标准石油公司垄断是对当时无政府式残酷竞争的自然反应。它反映了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大企业合并的最终趋势，洛克菲勒是赋予美国工业更加理性和有效模式的大改革家，洛氏目的并不只是积累财富，和当时与他一样的人，都是自我造就、力争上游，并在既定历史环境中践履自己理想的企业家。他们放弃道德批判的立场，认为正是19世纪的大企业家，在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并给予美国人较高生活标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爱略特·琼斯1921年在《美国的托拉斯问题》^①中，对托拉斯问题的兴起及美国的反托拉斯立法和司法过程作过较为详细客观的描述。此著述多论少，对托拉斯产生的经济背景、早期限制贸易的普尔组织、州反托拉斯立法、联邦反托拉斯立法、联邦最高法院几个典型反托拉斯案件的审理过程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杰里米·W. 金克斯所著《托拉斯问题》^②一书，对美国的反托拉斯问题描述得更为详尽，他本人曾是西奥多·D. 罗斯福的工业委员会主任，参与全国托拉斯问题调查，对美国早期政府反托拉斯的内幕了解得更为清楚。他从对普尔组织的论述入手，给美国反托拉斯问题作了全景式描述。书中有国会立法过程的论述，但对司法系统的反托拉斯判决似乎描述得更多。对反托拉斯的“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进行了总结。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控制托拉斯》从批评个人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呼吁政府出面“控制托拉斯”^③。以上著作几乎以当时人论当时事的方式，观察并对托拉斯问题做出自己的界定与分析，是珍贵的资料性文献。

企业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小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他不像尼文斯那样对大企业家作传记感兴趣，而着力于19世纪诞生在大公司里的新组织形式、新管理方法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形成过程研究。在《战略与结构：企业史中的几个章节》中，钱氏视大公司为涉及管理问题的复杂经济、政治与社会体系。他认为大公司的战略性增长，由不断变迁的人口、收入和技术要素引致，并对机会和发展需要的有意选择，组织托拉斯只为更加合理地使用现存资

① 爱略特·琼斯 《美国的托拉斯问题》(Eliot Jones, The Trust Problem of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1921年版。

② 杰里米·W. 金克斯 《托拉斯问题》(Jeremiah W. Jenks, The Trust Problem), 纽约1920年版。

③ 约翰·贝茨·克拉克 《控制托拉斯》(John Bates Clark, The Control of Trust), 纽约1914年版。



源并扩大收益。如果规模扩大了的企业要高效率地运营，新的增长策略就要求新的至少被改造过的公司结构与之相适应。结果是大型、高度集中、多功能托拉斯公司的出现，他从“创新”的角度肯定了企业家的活动^①。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中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内战至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垂直组织的垄断大公司如何改变了美国经济变迁的路径，它总结了托拉斯企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是资源积累与扩张的阶段；在第二阶段这些资源要被理性化分配；企业组织扩展其运作范围，开发了新产品确保对已有资源的最高效利用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则属于新结构被创造定型，以促进资源的使用去应付竞争环境对它提出的即时与长期挑战。剖析了大企业“横向兼并”与“垂直兼并”的具体过程，再次强调了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在引导这些变迁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暗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资源配置活动中逐渐被公司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取代^②。

但企业史研究并不是众口一词，瑙米·R. 拉莫鲁克斯在《美国企业中的大兼并运动（1895~1904）》一书中，用计量分析与个案研究方法总结出，1895年到1904年席卷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兼并浪潮中，共有1800多个企业在横向兼并中消失了，其中包括2/3控制着70%市场份额的企业。而且联邦政府管制州特许企业行为的职能局限阻碍了反托拉斯政策的执行，不能直接管制力量强大到足以设置进入障碍的大企业。更为滑稽的是，反托拉斯政策未能有效制裁大托拉斯，反而有碍中小企业的竞争行为。对几家兼并后垄断托拉斯的规模、效益进行具体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1893年的萧条与恐慌导致了反常的激烈价格竞争，并使生产者为了缓解生存压力走上兼并之路，但兼并没有带来规模效益，新的巨型公司照样设立市场进入的价格障碍。兼并不是适合所有大企业，不是对每个公司都有效，而且大兼并过程中的高成本，不可能使主导公司长久处于产业主导地位，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在保护市场竞争与主导企业生产效率方面，显得非常必要^③。她的论述是从“规模不经济”角度出发的。

托马斯·C. 柯克伦以商业习惯和商业价值为主线，来解释美国大托拉斯企业的出现，他认为美国社会的主要传统习惯都源于商业活动。其著《大公司的年代》中，突出用商业方法研究历史，并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获取营养，认为大托拉斯的社会权力取决于大企业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大公司对经济活动要素的垄断

① 小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中的管理革命》（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堪布里奇1959年版，第31页。

② 小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 《战略与结构：企业史中的几个章节》（Alfred D. Chandler, Jr.,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堪布里奇1962年版，第15页。

③ 瑙米·R. 拉莫鲁克斯 《美国企业中的大兼并运动（1895~1904）》（Naomi R. Lamoreaux,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堪布里奇1985年版，第11页。

控制权，就是美国商业文化的最终结果。他道出了商业活动对美国社会制度变迁带来的压力^①。

对大公司的认可与社会定位，格莱恩·波特著《大企业的崛起》有所记载。1860~1910年，工业资本主义成功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又引发政治混乱，美国人把预期社会形式的最基本问题提上日程，新工业秩序的经济与社会结果是贯穿该世纪国家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主题。美国社会渐进地接受了这种变迁，新的社会平衡出现了^②。在作者笔下，反托拉斯立法成为这个新平衡中保护美国民主政治的安全阀。

经济史学家、法史学家马丁·J. 斯柯拉对托拉斯问题的最后解决总结了一个模型，即“组合自由主义”。1988年其《美国资本主义的公司重建（1890~1916）：市场、法律和政治》一书出版，这是他考察进步主义时代反托拉斯辩论的成果。其中还顾及司法、立法及政治状态，产权、市场关系和经济思想史变迁的研究。他认为如果反托拉斯辩论的重要性只被认为是被管制的垄断集团与力主竞争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那么关于反托拉斯社会辩论将被庸俗化，反托拉斯辩论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社会现实构想的公开表达方式，要用不同的手段在辩论中达致不同的目的^③。其实反托拉斯辩论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旨在解决法律是否应该允许或禁止大公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重组，以及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应该沿国家主义原则还是非国家主义原则进行大公司重组等基本政治问题。从此意义上讲，斯柯拉的观点不无见地，但他没有解决在反托拉斯辩论中诞生的“组合自由主义”模式是如何并且何时成为政治现实这两个大问题。

从企业史的研究中成长起了结构主义学派，其中钱德勒已有论及，恕不赘述。其他如罗伯特·H. 威比、塞缪尔·P. 海斯等，都在论述进步主义时代的著作中旁及反托拉斯问题，他们都使用结构变迁与社会要素分析的方法，对托拉斯的出现、国家政治的变化以及托拉斯组织对美国社会生活方式施加影响等予以全面分析。威比著《企业家与改革：对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项研究》中，把垄断大公司崛起的时代定义为“组织化的时代”^④，认为托拉斯是大企业家在剧变世界

① 托马斯·C. 柯克伦《大公司的年代》(Thomas C. Cochran, *The Age of Enterprise*)，纽约1961年版，第131页。

② 格莱恩·波特《大企业的崛起》(Glenn Porter,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1860-1910*)，纽约1973年版，第27页。

③ 马丁·J. 斯柯拉《美国资本主义的公司重建（1890~1916）：市场、法律和政治》(Martin J.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The Market, the Law, and 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④ 罗伯特·H. 威比《企业家与改革：对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项研究》(Robert H. Wiebe, *Businessma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堪布里奇1962年版，第212页。



里找到的组织化生存手段。政府的反托拉斯行动，使美国政治资本主义找到废弃有关竞争立法，传统自由主义逻辑在工业化时代开始走失而遭遇现实中的经验两难。反垄断的改革者们，在塑造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的同时，力图引导群众放弃对大公司的不满，把他们对新秩序的愿望，改造到接纳、认可政治改革家们已经预设妥当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新资本主义路径上去。《寻求秩序（1877～1920）》则描述了19世纪80年代末，大公司的技术与经济力量造成的社会流动，不断冲击破坏着原有“孤岛式社区”^①的内在联系，这种社区关系已不能以传统方式发挥功能，内部分裂且让人们不知所措，结果只能寻求新秩序。威比把大托拉斯引致的社会关系重组，理解为新中间阶层通过行政手段达致个人抱负的过程。其实这只是大公司管理革命的一个结果而已。海斯在《资源保护与效率福音：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1890～1920）》一书中说道，对大公司的政府管制，反映了美国专业群体用计划管理弱化市场竞争的愿望，他注重新技术与人类环境相和谐的辩证法，并把“专家”抬高到最重要的位置，用效率理念和理性计划相同步的途径，剔除民主政府和管理市场制度变迁中的内在缺陷。它的论述把专业计划与政府的功能失灵联系起来，其实他并未点出政府在反托拉斯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韩铁教授，撰文《美国公司的历史演变与大企业的崛起》，论述了美国大企业的崛起及其历史条件^②。

（三）新左派史学对反托拉斯问题的探讨方法和论点

有的学派不像企业史学家那样，把大企业只看作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更关心它的政治意义与兼并给民主制度带来的威胁和压力。他们更强调大企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且趋向关注政府在反托拉斯改革中的失误和缺点，鼓吹只有美国社会制度激进变革才能彻底解决垄断问题，这就是“新左派”史学对反托拉斯问题所持的立场。

“新左派”对托拉斯的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采取两种不同形式。其中一个学者群体继承了改革传统，用批判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意识形态分析色彩较浓厚，但他们并不主张挖掘美国资本主义的坟墓，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卡尔·凯森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本人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经济研究所主任，且是当时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他提到大托拉斯在美国经济中有极特殊的重要性，由于巨型企业的规模，经济活动中的变化对其影响极少，反而小公司与消费者倒要受制于它们强大的经济权力，而且它们的投资决策与研究活

^① 罗伯特·H. 威比 《寻求秩序（1877～1920）》（Robert H.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纽约1967年版，第166页。

^② 韩铁 《美国公司的历史演变与大企业的崛起》，载《南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动对社会权力的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赋予托拉斯的较大市场控制能力，将导致它们拥有政治权力、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①。他在《联合型大企业：有多少权力、影响范围如何？》一文中指出，美国社会对大公司经济权力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控制方法：一是促进竞争市场的完善；二是政府代理机构实施控制；三是大企业内部行使权力时权责制度化。美国的传统做法是以反托拉斯的方式，依赖第一种途径实现对大公司的控制^②。但凯森的结论是模糊的，可能控制大公司将会是一项持久的历史任务，他对大公司政治问题的态度在“新左派”中尚属温和。由于60年代美国社会对战争、贫穷、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的厌弃，“新左派”中的一小部分学者继承了进步的改革传统，认为大企业控制下的美国社会已彻底无甚道德可言，亟需一场激烈的结构性变革去消弭这些缺陷。但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衍生物，按他们的理论逻辑，只有完全弃绝资本主义制度才能造就一个公正与和平的社会，大企业问题才会有一个最终解决，这似乎不大现实。

加布里埃尔·柯尔科是“新左派”的台柱子，其著《保守主义的胜利：美国历史的一个重新解释（1900~1916）》成为“新左派”史学的扛鼎之作，同时也是体现新左派思想方法的里程碑。该论著对大企业问题的分析思路是：发生于19世纪末的大规模企业兼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强度在世纪之交实际已大大增强，兼并运动与规模空前的联合公司资本化，也是该世纪竞争大潮的一部分。因此，企业领导人转求政府来控制竞争，且遇到可能导致财富重新分配的普通民主政治力量。最后结果是，拥有主导地位的大公司与政府结合，大联合公司求助政府管制，恰恰是因为丧失了效率^③，与钱德勒大企业极具效率的立场恰好相反。“探索工业化政治资本主义缺乏可选择的有效路径，稳健改革的保守主义思想最后获胜就自不待言，那些平民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不能理解，进步主义改革为何实际上只是以企业福利为措辞，界定公共福利事业的运动而已，而不是反托拉斯，他们最后都接受了经济力量集中的社会必要性”^④。

《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出版于1963年，当柯尔科以案例诠释该专著关于托拉斯问题观点的第二部专著《铁路与管制，1877~1916》1965年出版时，所持

① 卡尔·凯森《联合型大企业：有多少权力、影响范围如何？》，载爱德华·S·梅森编《现代社会中的大企业》（Carl Kaysen “The Corporation: How Much Power? What Scope?”, in The Corporation in Modern Society, ed. Edward S. Mason），堪布里奇1959年版，第215页。

② 同上，第231页。

③ 请参阅加布里埃尔·柯尔科《保守主义的胜利：美国历史的一个重新解释（1900~1916）》（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纽约1963年版。

④ 加布里埃尔·柯尔科《铁路与管制1877~1916》（Gabriel Kolko,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普林斯顿1965年版，第15页。



论点激起新左派内部另一派系学者的不满。小爱德华·A. 伯塞尔在1967年《美国历史杂志》12月刊（总第54期）发表专论《观念与利益：企业家与州际贸易法案》，对以上立论提出质疑，从大企业自身利益关注的角度来分析托拉斯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他代表了新左派对托拉斯问题的第二种分析体系。他在考察了企业家对1887年《州际贸易委员会法》通过时的态度后，得出与柯尔科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大企业的行为不是出于特殊意识形态的需要，对经济的政治控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只想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①。新左派对大托拉斯的态度较老进步主义者温和得多，他们都含蓄地认可了大托拉斯主导下的竞争模式。其实，不同学派对托拉斯问题的关注，最后都归结于美国须在民主体制框架内实现社会进步的梦想。

从20世纪40年代以至50、60年代，历史家的研究旨趣发生了变化。在反思进步主义史学家关于阶级、种族和社会集团冲突理论的基础上，新左派中兴起了“保守主义思潮”。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是该理论的领军人物，他把反托拉斯运动中的主要社会力量整合进“改革”的历史叙述框架，认为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的政治冲突反映了不同种族与宗教群体维护各自社会地位的原动力。他从观念形态上考察了反托拉斯运动对美国社会价值变迁轨迹的引导。在《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中，他把美国从内战到“新政”的历史理解为三个内在联系紧密、层层递进的改革阶段，研究了安德鲁·杰克逊、约翰·C. 卡尔霍恩、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12位总统和政治领导人后，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传统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它常常被放置在强调个体得失、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的旧意识形态基础上，平民党人和进步主义者于此都有类似缺陷；他们都不能够直面工业化且社会力量多元重组的美国。7年后，在专著《改革的年代：从布莱恩到弗兰克林·D. 罗斯福》中，他以反托拉斯改革运动中几个主要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为例，更具体地表达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平民党人是一伙略显单纯和幼稚的改革者，因为他们没有把农业问题置于国内经济生活向工业化转变以及美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地位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考虑，只是一味埋怨东部人、华尔街银行家、犹太人以及外来移民等异质社会要素给他们制造的困难。故而，在反托拉斯运动中与平民主义相结合的是一种由种族主义、本土排外主义、乡土观念组成的混合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释美国农业与乡村地区在全国偏执狂般普遍恐惧变迁氛围里所揣有的担心。他们依然恋旧，还向往着已经失去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国

^① 小爱德华·A. 伯塞尔 《观念与利益：企业家与州际贸易法案》，载《美国历史杂志》1967年12月刊（总第54期）（Edward A. Purcell, Jr., “Ideas and Interests: Businessman and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4 December 1967），纽约1967年12月刊，第561～578页。



伊甸园。进步主义的改革者也犯了与平民党人同样的幼稚病，但进步主义者略有不同，他们意图用自由主义改革把美国的制度调适到已经到来的工业化时代。他借用行为社会学理论，将反托拉斯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政治冲突定义成每一社会群体为确保其在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斗争^①。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里，许多社会群体如教士、律师、教授、老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等，都发现他们原来的权势与传统领袖地位已被工业寡头和一种异质文化控制下的新政治机器代替了。这些被边缘化的旧社会精英们，用道德圣战恢复清教传统与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也是进步主义者在反托拉斯运动中所处的立场。

乔治·E. 芒理是最早提出反托拉斯运动“地位担忧论”者之一，但该解释却被霍夫斯塔德发扬光大。芒理是研究进步主义运动与西奥多·D. 罗斯福的著名历史学教授，他认为反托拉斯运动是一场重新确认和获得个人主义价值观新生的社会改革运动，但他们不愿为此去发动一场根本的经济变革或在更大程度上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②。

(四)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反托拉斯问题研究的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反托拉斯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研究课题，美国的反托拉斯问题也是国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史学研究领域，也有一定数量的前期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胡国成先生撰写了《美国反托拉斯立法研究》一文，发表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9 期，论述了美国早期反托拉斯立法的过程，并对法令的内容作了评价。他认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阶段，制定法规限制不平等贸易是保证经济繁荣的关键”^③。1995 年，胡国成先生在《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早期反托拉斯立法的情况，并将美国反托拉斯活动放置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框架中进行论述^④。

黄安年先生撰写了《美国完善垄断和公平竞争立法的历史演变》一文，指出“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是逐渐由严格解散大公司到疏导管理的国家政策”^⑤，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 《改革的年代：从布莱恩到福兰克林·罗斯福》（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纽约 1955 年版，第 11 页。

② 乔治·E. 芒理 《一个加利福尼亚的进步主义者与他的理性：在中层阶级政治中进行的一项研究》（George E. Mowry, The California Progressive and His Rationale: A Study in Middle Class Politics），纽约 1949 年版，第 236 页。

③ 胡国成 《美国反托拉斯立法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9 期。

④ 胡国成 《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年版。

⑤ 黄安年 《美国完善垄断和公平竞争立法的历史演变》，载《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